

新大众文艺语境下张艺谋的创作新动向

——以《惊蛰无声》为例的美学转向

李施馨绮

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 201112

DOI:10.61369/HASS.2026040026

摘 要：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挑战了传统精英批评体系，呼唤建立兼顾大众参与与艺术水准的评价框架。本文以张艺谋《惊蛰无声》为案例，分析其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下的创作特征：题材上从“历史寓言”转向“当代镜像”，叙事上强化观影体验感，视听语言上从“视觉奇观”转向“感知沉浸”。研究发现，张艺谋的创作立场正从“作者”转向“对话者”，在保持视听表意能力的同时将个人理念下沉至大众可感知的层面，与新大众文艺形成深层共振。这一转向为重构电影批评范式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 键 词：新大众文艺；张艺谋；《惊蛰无声》

New Trends in Zhang Yimou's Creative Works in the New Mass Literature Context — An Aesthetic Shift Illustrated by "Silent Awakening"

Li Shixinqi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Shanghai 201112

Abstract： The rise of new mass literature and art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elite criticism system, calling for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that balances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artistic standards. This paper takes Zhang Yimou's *Unheard Spring*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its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text of new mass literature and art: a shift from "historical allegory" to "contemporary mirror" in subject matter, enhanced viewing experience in narrative, and a turn from "visual spectacle" to "perceptual immersion" in audiovisual language. The study finds that Zhang Yimou's creative stance is shifting from "author" to "dialogist," while maintaining his audiovisual expressive ability, sinking personal ideas to the perceptible level of the public, forming a deep resonance with new mass literature and art. This turn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for reconstructing film criticism paradigms.

Keywords： new mass literature and art; Zhang Yimou; "Silent Awakening"

一、新大众文艺的媒介技术背景与批评范式转换

（一）问题的提出：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与批评范式的困境

“新大众文艺”的提出以数字技术对媒介的深度介入为宏观背景，数字技术深刻地形塑了当下的媒介环境和文艺创作形态。作为对互联网、人工智能所塑造的新型媒介语境中文艺创作实践的系统性总结，“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精准捕捉了当下文艺形态的变革。自2024年《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宣告“新传媒时代到来，新大众文艺兴起”^[1]以来，该议题迅速引发学界广泛讨论，成为文艺研究的前沿热点。曾庆香、刘苏仪将其内涵归纳为“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下，借助互联网及其催生的算法、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媒介技术的驱动，呈现出普通大众广泛参与创作、数据驱动或人机协作、艺术门类互通、表现形式融合共生等新特征中的一种或多种的大众文艺。”^[2]

然而，面对这一新兴文艺形态，传统的、基于专业壁垒与经典审美范式的精英批评体系显得力不从心。丁亚平敏锐地指出在现今的媒介环境下，传统电影所依赖的叙事与审美体系正在遭遇

瓦解，“电影性”的生成机制正在被重新编码，“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恰恰建立在这一‘电影性’的解构之上”。^[3]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修整乃至重建电影的审美评价体系，建立一种顺应新大众文艺语境的、既尊重大众参与又保持艺术水准的评价体系——在保持专业批评的艺术判断力的同时，将传播接受度、技术感知维度、大众情感结构等纳入批评视野。

（二）《惊蛰无声》的案例价值与论文框架

在此理论背景下选择2026年春节档张艺谋导演的作品《惊蛰无声》作为分析案例，试图将当下新大众文艺的媒介环境融入影片评价体系中，具有三重价值：

第一个方面，张艺谋作为跨越中国电影发展各阶段的标志性导演，其创作轨迹的演变本身就是中国文艺生态变迁的缩影。第二个方面，《惊蛰无声》作为当代国安题材的开创性作品，直面“战机隐身涂层泄密”“AI换脸诈骗”等真实案例，回应了大众对“在身边”的安全议题的现实关切，这种题材选择与当下性的追求，与新大众文艺“真实性”的表达特征高度契合。第三个方面，《惊蛰无声》票房突破10亿、引发广泛社会讨论的事实本身，

就提示我们需要用经过迭代的评价框架来理解其价值。

因此,本文将从新大众文艺的背景出发,首先分析《惊蛰无声》的创作特征如何回应新大众文艺的诉求,继而探讨张艺谋创作新动向所体现的从“作者”到“对话者”的位移,最后在通过从这一影片案例的拆解和分析中总结回应新大众文艺评价体系建构的问题。

二、新大众文艺语境下《惊蛰无声》的创作特征

(一) 题材选择:“在身边”的当代性与大众关切

《惊蛰无声》作为张艺谋在谍战类型上的再度探索,其最显著的转向在于题材的时间轴从历史拉回当下。影片由国家安全部指导创作,直接取材于“战机隐身涂层泄密”“AI换脸诈骗”等真实国安案件,从而实现了从“年代谍战”到“身边谍战”的范式转换——《悬崖之上》将谍战置于风雪漫天的伪满时期,以历史的距离感营造叙事张力;而《惊蛰无声》则让隐秘战线悄然潜入观众日常穿行的城市空间、每日使用的智能设备之中。正如张艺谋在《于无声处听惊雷》中所言,《惊蛰无声》将镜头对准当下的时代、观众切身所处的城市,“当谍战从历史走到我们身边,它所呈现的临场感与意义便有了很大不同”^[4],《惊蛰无声》的故事首先强调在场感,调动起观众的生活经验。

这一转向恰恰与新大众文艺日常生活化的特征形成同构。新大众文艺凸显接地气和在长兴,文艺创作扎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将宏大主题转化为可感知的身边场景。《惊蛰无声》对“身边谍战”的呈现,正是将“国家安全”这一抽象概念,通过“外卖订单传密”“陌生 WiFi 风险”等具象情节,还原为大众触手可及的日常场景。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获得的,不再是对遥远历史的凝视,而是对自身所处技术社会的重新审视,正是新大众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影视创作注脚。

(二) 叙事策略:高密度类型片与大众观影体验的适配

《惊蛰无声》在叙事策略上呈现出鲜明的快节奏特征。张艺谋力求在有限的空间内构建引人入胜的故事,既设置“钩子”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又兼顾情节的铺垫与惊喜的呈现。影片整体叙事结构紧凑,故事主线上通过“惊蛰计划启动、怀疑陈依、怀疑黄凯、黄凯策反悬念、严迪身份揭示、严迪双重间谍身份揭示”等多重反转的密集排布,持续调动观众的注意力。结尾通过“谍中谍”的叙事调动观众疲软的注意力,易洋千玺所饰演的严迪实为安插在国安部的真正间谍,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观众对于间谍片这一类型的民族主义期待;但最终揭示出张译所饰演的王副局长与严迪暗中配合,严迪实际上以双重间谍的身份效力最终效力于国安局,又将主题拉回正轨。与此同时,在小故事线上,如黄凯与女特务白帆的人物关系、李楠逃离境外的成功与否等,亦设置了多重反转,使得整部影片的转折设置环环相扣、张弛有度。在《惊蛰无声》中,每一场戏都被赋予明确的叙事功能,信息释放与情绪积累交替推进,形成一种近乎“章节式”的紧凑节奏,使观众始终处于高度的叙事卷入状态。

诚然,这一叙事策略带来的剧情漏洞、强行反转等问题不容

忽视,但在新大众文艺的语境下,以即时情感满足为核心的“爽感”机制已然成为网络叙事的重要法则^[5]。如何在流量逻辑与艺术价值之间寻找平衡——这一张力并非《惊蛰无声》独有,而是所有试图与大众深度对话的作品都必须面对的权衡难题。

(三) 视听语言:技术赋能与大众感知的对接

《惊蛰无声》在视听语言层面展现出鲜明的技术自觉,无人机、监控视角等的使用将前沿影像技术转化为与大众感知经验深度对接的叙事语言。影片超过40%的动作戏使用无人机航拍,无人机航拍的高空俯冲镜头将深圳、上海的玻璃幕墙、钢筋丛林切割为几何化的谍战棋盘。这种俯瞰视角与遍布城市的天网监控镜头相交织,构成了一个全景式的视觉监控网络,不仅营造出“无处可逃”的窒息感,更与年轻观众熟悉的游戏视角形成感知层面的共振,呈现出新大众文艺所具有的“表现形态融合共生”的影游融合、媒介融合特征。

在剪辑节奏与镜头调度上,影片同样体现了对当代观众感知习惯的深度适配。据统计,全片采用217次非常规跳切;对话戏剪辑上多采用跳切,特写镜头以平均2秒间隔进行切换;审讯戏中易烱千玺的面部抽搐、键盘敲击声、监控画面被碎片化拼贴,模拟信息过载的情报战节奏,用割裂感暗示人物信任崩塌。这种高频跳切的手法精准切合了互联网时代的注意力法则——在短视频、社交媒体培养的“短平快”感知习惯面前,传统慢热、铺陈的叙事方式已难以留住观众。对话戏的镜头时长短且碎,单句台词常被切割成多个不连贯片段,传统叙事流畅性被打破。《惊蛰无声》的镜头剪接呈现出短视频化的趋势,高密度、快节奏的视听组合体现出“电影性”在新大众文艺的媒介环境下所面临的重构。

三、新大众文艺语境下张艺谋的创作新动向

(一) 从单一媒介到形式融合:新兴媒介逻辑的渗透

新大众文艺的勃兴,根植于数字技术对文艺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深刻重塑。互联网时代,游戏、短视频等新兴媒介形式深度重构了大众,尤其是以“Z世代”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审美经验与感知结构;观众的注意力法则、叙事期待与参与诉求也发生了位移。张艺谋近年来的创作,正是在这一新大众文艺的语境中展开的主动调适——他敏锐地捕捉到新兴媒介对大众审美经验的塑造力,将这些媒介的叙事逻辑与交互特征转化为电影语言的新质素,形成“跨媒介融合”的创作新形态。

在《惊蛰无声》中,张艺谋将游戏中的“全景视角”转化为电影的核心视觉语言,同时借鉴短视频的剪辑逻辑,使“短、平、快”的碎片化节奏内化为影片独特的镜头节拍。张艺谋在影片中大量运用无人机航拍镜头,将其塑造为“空中之眼”的叙事载体,在新大众文艺的视域下,这一选择具有更深层的意涵:无人机视角的运用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创新,更是对当代观众媒介经验的深度调用——它让观众代入“全知位置”,将城市空间转化为可被扫描、追踪、操控的游戏地图,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调用的不再是传统电影培养的凝视习惯,而是短视频培育的快速切换能力、游戏培育的空间感知模式、社交媒体培育的多线程信息处理方式。

《惊蛰无声》的游戏全景视角清晰揭示出张艺谋创作的一个新动向：他并不将新兴媒介视作电影的对立面或威胁，而是主动将其形式逻辑吸纳为电影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中重新定义电影与观众的关系。这一新动向的意义，恰在于它回应了新大众文艺环境下电影创作与研究必须面对的核心命题——当大众的审美经验已被新兴媒介深刻重塑，电影若要继续与时代展开有效对话，就需要走出封闭的媒介边界，在融合与互动中探寻新的可能，探索和延伸“电影性”的边界。

（二）从精英独白到大众言说：作者姿态的转向

从早期作为“第五代导演”代表所秉持的个人化的美学表达，张艺谋的创作立场逐渐演变，走向与大众审美、社会情绪及公共议题展开主动对话的层面。在这一转向过程中，他的表达方式不断下沉，既未彻底放弃作者性的立场，又将个人化的艺术理念下沉至通俗易懂、可感可共鸣的叙事层面，在对话中实现对大众的审美传递。

与此同时，技术的迭代为张艺谋的视听表达提供了不断丰富的语汇库。如果说早期创作受限于胶片时代的技术条件，其视觉风格更多地依赖美术置景与色彩调度，那么在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他的影像语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惊蛰无声》中无人机航拍构建的“全景俯瞰”视角、《坚如磐石》中LED虚拟拍摄营造的光影迷宫，都是技术赋能下作者性表达的新形态。从胶片时代到数字时代，张艺谋始终保持着将视听语言转化为表达手段的能力，变化的是技术手段的丰富与更新，不变的是他作为电影作者对影像表意可能性的持续探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下沉”并非作者性的消退，而是作者性在新时代语境下的重新锚定。

四、张艺谋的“转身”与新大众文艺的批评范式重构

通过对《惊蛰无声》创作特征的剖析与张艺谋创作新动向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新大众文艺的媒介环境下，这位跨越中国电影发展各阶段的标志性导演的创作立场正在“转身”——从“作者”走向“对话者”，从而不断拓展“电影性”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下的涵义边界。

从题材选择上看，《惊蛰无声》代表着张艺谋的谍战类型片创作实现了从“历史寓言”到“当代镜像”的转换，与新大众文艺“日常生活化”的表达特征形成深度同构；从叙事策略上看，影片融合新兴媒介特征，注重观众的“观影体验感”，都提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爽感”机制与艺术价值之间的关系——在新大众文艺的语境下，一部作品能否让绝大多数观众获得即时情感满足，已然成为不可回避的评价维度；从视听语言上看，影片通过吸收游戏视角、短视频剪辑机制等媒介机制，完成了从“视觉奇观”到“感知沉浸”的美学转向，体现出新大众文艺“表现形态融合共生”的媒介特征。

从《惊蛰无声》中可见，在作者姿态上，张艺谋实现了从“精英独白”到“大众言说”的立场位移。他并未放弃作为电影作者的视听语言表意能力，而是将这种能力下沉至大众可感知、可共鸣的叙事层面，在对话中实现对大众的审美传递。

综上所述，《惊蛰无声》的价值，需要用新大众文艺的评价框架来重新理解。将其置于新的文化生态中考察，它回应新大众文艺情感结构、参与机制与价值诉求的有效性，恰恰构成了其独特的“时代价值”。回到引言中提出的问题：新大众文艺需要建立怎样的评价体系？通过《惊蛰无声》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勾勒出这一体系的轮廓。首先，评价体系应当是“双轨制”的并存——专业批评继续坚守艺术标准，但需要承认大众文艺所追求的“真”与“诚”具有独特的价值维度；其次，评价维度需要将传播接受度、技术感知方式、大众情感结构等要素纳入批评视野。在新大众文艺的媒介语境下，“电影性”正被新兴媒介形式、表达主体的多元化等要素所解构并重构——电影不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艺术文本，而是一个向观众开放的符号系统。这意味着电影批评范式也需要完成相应的转向：从对“作品完整性”的静态评判，转向对“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追踪；从对“作者表达”的单向阐释，转向对“观众参与”的双向对话。张当技术日益自主、媒介深度融合，电影若要继续与时代展开有效对话，就需要像张艺谋这样，走出封闭的媒介边界，在融合与互动中重新定义自身——这既是《惊蛰无声》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新大众文艺对所有电影创作者的期待。

参考文献

- [1]《延河》编辑部. 新媒体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 [J]. 延河, 2024(7).
- [2]曾庆香, 刘苏仪. “人民导向”与“技术驱动”: 新大众文艺的历史源流、范式重构与发展路径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5(4): 113-123.
- [3]丁亚平. 新大众文艺时代电影的美学变革及其多栖态引擎的意义 [J]. 电影艺术, 2025(5): 71-77.
- [4]张艺谋. 于无声处听惊雷 [N]. 人民日报, 2026-02-21(8).
- [5]李松. 数智时代新大众文艺的科技伦理重构 [J]. 艺术百家, 2025(4): 39-46.